



中国现代传播体系的全球建构

【北京专访 魏英 李洪岩】

“中国传播学”的提出，是传播学中国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标志着中国传播学在理论建构上的自觉，也体现了中国传播学在实践探索上的自信。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传播学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传播体系的建构。

李洪岩指出，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传播智慧，如“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等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同时，中国传播学也积极借鉴国外传播学的先进成果，实现了本土化与国际化、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在实践层面，中国传播学正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传播学正为全球传播体系的建构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李洪岩的学术经历与学术贡献

李洪岩，1963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毕业于山东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教授、威海分校党委书记、威海分校校长等职。现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教授、威海分校党委书记、威海分校校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著有《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中国传播学》等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



李洪岩，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教授、威海分校党委书记、威海分校校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著有《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中国传播学》等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是促进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李洪岩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不仅有助于韩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也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韩国文学。通过韩文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的精髓得以传播到韩国，促进了中韩两国文学的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

李洪岩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需要注重翻译的质量和水平。只有高质量的翻译，才能真实地传达中国现代文学的精髓。同时，也需要注重翻译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不断探索新的翻译方法和途径，提高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水平。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

李洪岩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不断探索和总结，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

李洪岩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是促进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通过韩文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的精髓得以传播到韩国，促进了中韩两国文学的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

李洪岩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需要注重翻译的质量和水平。只有高质量的翻译，才能真实地传达中国现代文学的精髓。同时，也需要注重翻译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不断探索新的翻译方法和途径，提高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水平。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

李洪岩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不断探索和总结，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近期译述

2-3 周 阿多尔诺

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探讨了启蒙运动的辩证法，指出启蒙运动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异化和压迫。阿多尔诺认为，启蒙运动导致了工具理性的泛滥，使人类陷入了新的困境。

4 周 哲学

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海德格尔则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的哲学过于强调理性的作用，忽视了人的存在本身。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为现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7 周 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



李洪岩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不断探索和总结，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15 周 社会等

李洪岩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是促进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通过韩文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的精髓得以传播到韩国，促进了中韩两国文学的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

16 周 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



李洪岩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需要注重翻译的质量和水平。只有高质量的翻译，才能真实地传达中国现代文学的精髓。同时，也需要注重翻译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不断探索新的翻译方法和途径，提高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水平。

李洪岩学术贡献

李洪岩在文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中国传播学》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研究为传播学中国化、文学韩文翻译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在文本中寻找艺术真实

——关于文学翻译的一点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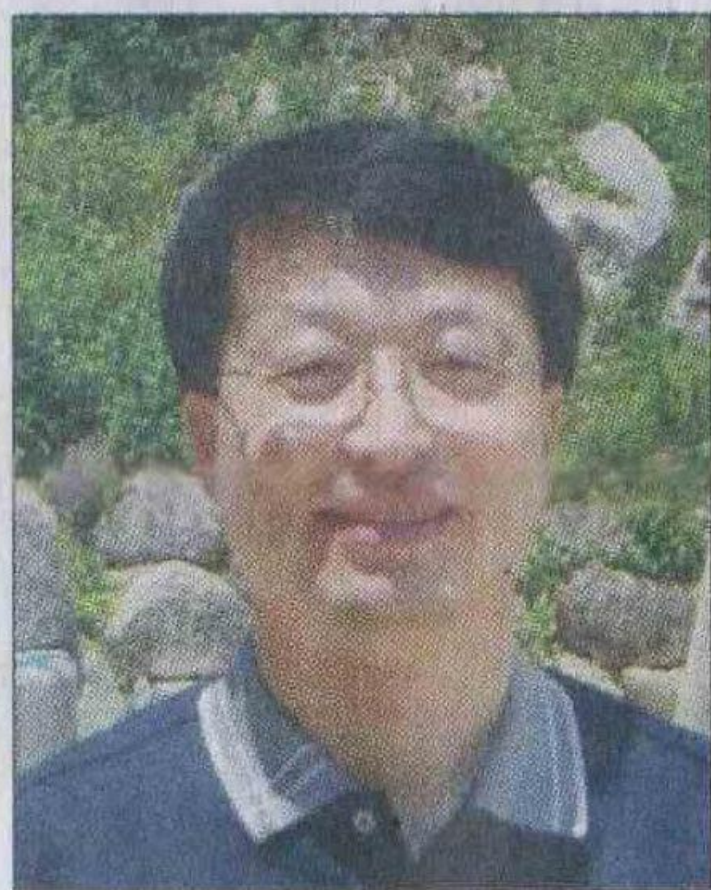


文学翻译是连接不同文化的重要桥梁。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如何寻找艺术真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旨在探讨文学翻译中的艺术真实问题，为文学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首先，文学翻译中的艺术真实，是指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文学翻译不仅要传达作品的字面意思，更要传达作品的艺术精髓。这就要求译者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艺术修养，能够准确把握作品的艺术真实。

其次，文学翻译中的艺术真实，还体现在对原作风格的忠实再现上。不同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译者需要根据原作的风格，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语言风格，使译文能够真实地再现原作的艺术风貌。

最后，文学翻译中的艺术真实，还体现在对原作情感的准确传达上。文学作品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译者需要通过细腻的情感把握和精准的语言表达，使译文能够真实地传达原作的情感力量。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

□金惠俊

最早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动向介绍到韩国的是梁白华。他翻译了日本人青木正儿的文章,并以“以胡

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为题在1920年11月的《开辟》上发表。之后,在1927年8月,柳基石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以青园为笔名在《东光》上连载。1929年1月,梁白华

在开辟社翻译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自此,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理论著作的翻译逐渐展开,特别是近年来,翻译出版活动表现得更为活跃。

形成了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读者层

在梁白华、丁来东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曾一度引起韩国社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开始受到重挫,特别是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项工作完全陷入崩溃状态。虽然在1945年光复后,曾出版了金光洲、李容圭译的《鲁迅小说选集》,但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0年韩

国战争的爆发,两国的外交关系断绝,自此以后的数十年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被迫中断,留下了一段空白。

自1970年代起,这一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以1972年为起点,韩国中文系的数目迅速增加。虽然早在日本殖民地时代汉城大学就设立了中文系,但是直到光复前不过只有9名毕业生,光复后,每年也不过只

有一到三名毕业生。到1972年,高丽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大学先后设立中文系,之后逐年都有增加。到目前为止,韩国共有11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中文课程。

随着中文系的增加,由此培养了大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及精通中韩文翻译的人才,而且,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读者层。与此相同的变化也体现在

各种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学位产生趋势上。到1980年为止的数十年间里,在韩国发表的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硕士论文不足10篇,但进入1980年代以后,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至于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以来每年有数篇,尤其是1993年和1996年各有12篇。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具体表现在以下门类的著作中。

理论著作(包括评论)的翻译

1980年以前,理论著作不过10本,之后,每年都有几本理论著作出版发行。最初,与作家介绍有关的书籍较多,如《当代中国大陆作家评介》(黄南翔,1985),《当代中国作家风貌》(彦火,1986)等。到1990年前后文学史类的译书相继出现,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朱德发,1989),《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黄修己,1991)等。

后来,理论著作的翻译发展方向则更趋于对不同文体的专门介绍,如《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钱光培,1998),《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李晓虹,2000)等。值得注意的是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向中文系学生及一般大众介绍中国现代文学进展状况的最基本的著作。1991年翻

译出版的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其丰富的内容、完善的体系和文化现象优先的观点,堪称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到目前为止,历经四次再版,它对韩国中文学界的影响甚大。另外,一些学者翻译的日文版和英文版的著作尤其值得注意。如《鲁迅评传》(丸山昇,1982),《中国现代文学史》(菊地三郎,

1986),《中国文学この百年》(藤井省三,1995),《中国の栄光と悲惨:评传赵树理》(釜屋修,1999);以及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Paul G. Pickowicz, 1991)。这些书的出版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观点,拓宽了信息渠道。但日文版、英文版书籍翻译的数目相对较少,还需作更多积极的努力。

在文本
——关于文

批



□陈思和

最近一家出版社
文学批评白话集

在梁白华、丁来东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曾一度引起韩国社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开始受到重挫,特别是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项工作完全陷入崩溃状态。虽然在1945年光复后,曾出版了金光洲、李容圭译的《鲁迅小说选集》,但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0年韩

国战争的爆发,两国的外交关系断绝,自此以后的数十年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被迫中断,留下了一段空白。

自1970年代起,这一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以1972年为起点,韩国中文系的数目迅速增加。虽然早在日本殖民地时代汉城大学就设立了中文系,但是直到光复前不过只有9名毕业生,光复后,每年也不过只

有一到三名毕业生。到1972年,高丽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大学先后设立中文系,之后逐年都有增加。到目前为止,韩国共有11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中文课程。

随着中文系的增加,由此培养了大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及精通中韩文翻译的人才,而且,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读者层。与此相同的变化也体现在

各种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学位产生趋势上。到1980年为止的数十年间里,在韩国发表的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硕士论文不足10篇,但进入1980年代以后,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至于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以来每年有数篇,尤其是1993年和1996年各有12篇。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具体表现在以下门类的著作中。

理论著作(包括评论)的翻译

1980年以前,理论著作不过10本,之后,每年都有几本理论著作出版发行。最初,与作家介绍有关的书籍较多,如《当代中国大陆作家评介》(黄南翔,1985)、《当代中国作家风貌》(彦火,1986)等。到1990年前后文学史类的译书相继出现,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朱德发,1989)、《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黄修己,1991)等。

后来,理论著作的翻译发展方向则更趋于对不同文体的专门介绍,如《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钱光培,1998)、《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李晓虹,2000)等。值得注意的是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向中文系学生及一般大众介绍中国现代文学进展状况的最基本的著作。1991年翻

译出版的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其丰富的内容、完善的体系和文化现象优先的观点,堪称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到目前为止,历经四次再版,它对韩国中文学界的影响甚大。另外,一些学者翻译的日文版和英文版的著作尤其值得注意。如《鲁迅评传》(丸山昇,1982)、《中国现代文学史》(菊地三郎,

1986)、《中国文学この百年》(藤井省三,1995)、《中国の栄光と悲惨:评传赵树理》(釜屋修,1999);以及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Paul G. Pickowicz, 1991)。这些书的出版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观点,拓宽了信息渠道。但日文版、英文版书籍翻译的数目相对较少,还需作更多积极的努力。

小说的翻译

1970年代以前的译本约10本,1970年代的译本合计不过10本而已。但进入1980年代后,译本的数量逐年增加,到1980年代后期,平均每年都有10多本译本出版发行。特别是1992年中韩建交后,小说的翻译得到飞跃性发展,在1992年后的连续几年中每年都有30多本的译本出版发行。在1997年韩国经济风波前后,小说的翻译工作暂时处于低潮,但后来又呈增长之势,小说翻译数量的演变,鲜明体现了中韩两国关系的改善对文学创作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这里有几点颇值得注意:一是1989年中央日报社与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专家合作出版的《中国现代文

学全集》。这一全集共20本,其中包括16本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剧本集和评论集各一本。这些作品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个时期,堪称是各个体裁的代表作,译者大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各领域的专家,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容易被人忽视的台湾作品也被收录其中,这是以往不曾有过的飞跃发展,是中国现代文学各个领域的分散性研究的具体化。在可靠的译者与可信的出版社积极合作下,这一全集得以出版发行,必将给韩国普通读者以深远的影响。二是琼瑶小说的大量出版。自1980年代中后期起,每年都有两三部琼瑶的小说被译成韩文,但并未在韩国读者中引起强烈的

共鸣。1992年,韩国的SBS电视台将琼瑶的小说《金盏花》改编成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深受韩国观众的喜爱,自此琼瑶的小说被大量译成韩文,仅1992年这一年就有24个译本出版发行。迄今为止约有75个译本出版发行。我以为,琼瑶的全部小说几乎都翻译出版过,与琼瑶风格相似的大众作家朱秀娟、李碧华等人的小说也被大量译成韩文。三是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小说翻译过程中一直存在的问题,那就是鲁迅小说不断被重译出版的问题。其实收录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鲁迅的小说不过只有33篇,完全可将其编辑在一本书里出版发行。但目前为止出版的

鲁迅小说却已达60本,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首先是因为鲁迅的作品具有极高的代表性,它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的标志存在的。但从另一侧面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大量的优秀作品,这种对特定作家的作品进行过分强调是否可取?鲁迅和琼瑶小说的译本多达135本,占小说翻译总量400本的1/3。由此可见问题的严重性。还有,除大众文学外,中国港台的严肃文学作品很少被介绍到韩国。再就作品的时间而言,大多集中在1949年以前和1976年之后,而1949年至1976年间的作品却相对少见。

□陈思和

最近一家出版社文学批评自选集,我几组对当代作家跟踪章,这些作家大多在开始创作,1990年代熟,而到新世纪都拿作。我是他们的同时创作与我的批评一起承担着解释社会、批评任。20多年来,我评论品远不止这些,论述品的文章也不止这些,选了有代表性的几篇这个领域工作的长性。当下文学批评是风气和文学创新中发它及时反馈文学作品,不可能像学术研长时间的积淀和观察,批评的形式主要是文也不可能涉及大量的文学史背景。所以,要

散文的翻译

小说领域反映出的过于偏重某一作家的情况在散文领域也同样存在。不同之处在于：散文领域偏重的不是鲁迅等人的散文，而是林语堂的散文。在已出版的近 150 本散文集中，林语堂的散文占了一半，并且在这中间，仅以“生活的艺术”命名的散文就有 20 本。1980 年代以前翻译的中国散文绝大多数是林语堂的作品。尽管在 1950 年代到 1990 年代间，把林语堂的新作译成韩文的情况并不多，但这期间几乎每年都有几本林语堂的散文出版发行。林语堂的散文在韩国盛行的原因大概不

仅在于其作品本身，还与他曾被推举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以及后半生主要活动于海外，从事英文创作，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等因素密切相关。林语堂的散文集大多是以其英文版底稿为依据被翻成韩文的，因此可能会有人提出疑问，在韩国出版的林语堂的散文能否归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创作这一范畴。我认为，韩国的大部分读者一直认为林语堂是中国人，其作品是中国现代散文，况且以英文版形式出版的林语堂的作品中的大部分是其中文创作的英译本，因此对林语堂的散

文理应归属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总之，林语堂的作品对韩国读者影响很大，这一点可与鲁迅和琼瑶相提并论。与林语堂相比，鲁迅散文的韩译本相对不多，但仍有 10 多本，特别是李旭渊编译的《朝花夕拾》（鲁迅，1991）堪称是散文界的畅销书，深受读者喜爱。此外，载入韩国中学课本的《背影》的作者朱自清的散文集以及郭沫若的四本自传也都被译成韩文。鲁迅、朱自清、郁达夫等 20 世纪前期的优秀散文家的作品虽只有很少一部分被介绍到韩国，但毕竟还可见到。令人遗

憾的是像杨朔、秦牧、刘白羽等 20 世纪中期以及贾平凹、王英琦等 20 世纪后期的散文名家的作品在韩国几乎找不到。让人略感安慰的是，1990 年代中期以来散文集翻译的数量逐年增加，且并非集中于某一位散文家的作品，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例如，风靡于台湾和大陆的三毛、席慕蓉的作品已有几本被介绍到韩国，余秋雨的《文化苦旅》（2000）也在韩国出版。这不仅是出版社考虑商业利益的结果，同时也意味着这些与生活紧密联系的作品最易在读者中产生共鸣。

诗歌与剧本的翻译

与小说和散文相比，对中国现代诗和剧作的翻译显得大为不足。到目前为止，韩国出版的中国现代诗集只有 25 本左右。在此情况下，对中文现代诗的翻译仍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许世旭翻译的《中国现代诗选》（1976）等几本诗集。许世旭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相当出色的诗人，无论是在选诗方面还是在翻译方面他都有其独到之处。二是艾青和北岛的诗有几本已被译成韩文出版，这也许与他们都曾被选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有关。三是近年

来，顾城、傅天琳、舒婷等诗人的作品被译成了韩文。与诗歌相比，剧本的翻译显得更加惨淡，仅有《雷雨/茶馆》（曹禺/老舍，1989）等不足 10 部。剧本不仅是阅读对象，同时也是为演出服务的，因此，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剧本有不利之处。另外，此间在韩国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攻读戏剧文学的人士很少，这也是剧本不能被大量介绍到韩国的原因之一。

如前面所述，到目前为止，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韩文著述大致有

理论书 60 本、小说 400 本、散文 150 本、诗集 25 本、剧本 10 本，合计不足 650 本。如单纯从数字上看，这些似乎已经很多，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个数字并不算多。况且，在这些译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重复翻译的，还有一些完全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的低级的低大众小说。认识到这些问题，我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做的翻译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

还应注意的是，韩国除中央日报

社编纂的全集外，其余大部分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翻译都处于无系统的零散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出版社以及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专家学者无计划的翻译造成的。出版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书籍较多的出版社有弘益出版社（15 本）、汎友社（8 本）、青年社（8 本）、日月书阁（8 本）、五車社（6 本）、高丽苑（6 本）、明文堂（6 本）、惠园出版社（5 本）、白山书堂（5 本）。其中弘益出版社出版的主要是琼瑶的小说以及一些大众小说，其余的出版社出版的数量少，所以很难找到共同点。

重视翻译的作用

相对于学术论文和新闻纪事的翻译，文学作品的翻译具有更多的难点。这是因为一篇理想的文学作品应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要求词语与词语之间甚至词语与符号之间互相呼应，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把一篇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用历史与文化背景不同的另一种语言体系毫无损伤地翻译出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文学作品的翻译并非只涉及如何正确地把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问题。比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地把握作品的内容，如何恰当地评价作品，以及怎样看待作者的创作观等问题。不同社会之间的互相接触不可避免地需要翻译工作，因此，尽管目前在翻译方面可能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还不得不承认翻译的重要意义。我认为，在将中国

现代文学译成韩文的过程中有几个难点应该注意：一是因缺乏对原文的理解造成的误译，二是漏译和添译，三是译文的不自然，四是原文的特殊性，五是名词的音译和意译，六是灵活运用的问题，七是直译和意译的关系，八是理论著作中文献名的统一。

今天，在影像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对文学作品的兴趣逐渐减少。即使这样，跟其他领域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像韩中两国的交流一样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再加上，参考前车之鉴，这方面的商业性成功也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因此，学术界也不能只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交给市场，应该更有意识、更积极地倾注关心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更健全、更活跃的发展局面。

（作者系韩国釜山大学教授）

还是需要另外一些途径形式。

我采取的基本方法是些我所认可的作家。我所作为对象的作家，往往就实验材料，他们创作风格的变化，都不可能在那里全部呈现，需要有长期观察的耐心，逐步地掌握创作部创作。这对于研究古代者现代文学中已经去世的说不存在困难，因为他们的作品都作为遗产陈列在前，基本上是定型的，完当代作家则不一样，他们是未知的，动态的，也就是法就他的全部创作（包括创作）作终极考察，所以批当代作家的断语是一种未形式，需要经过以后岁月考验。批评家把一个当代人他所观察的名单，就意把作家看做是终身不渝将会陪伴着他，读他的主要著作，随时观察作家在路上发生的些微变化，这踪批评大约需要几十年的能够完成。唯有学院批评做到，在这里，学院批评与利、兴风作浪的媒体批评清了界限。

当下文学批评的对象文本，也可以将这种批评作文本分析。文本分析不新批评的专利，它可以新方法。从观念上说，我以为，是要建立起一种对文本信任文学文本一旦形成就身的生命能量。当一个创作时，他是用虚构的方作文本，但是，随着他进入的佳境以后，他就会慢慢他的虚构并非是随心所欲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创作，指挥他的思路，一步步开展下去。这些力量来自生命逻辑。也许有人以为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往期回顾](#)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

作者: □金惠俊 日期: 2010-2-4 16:22:00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最早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动向介绍到韩国的是梁白华。他翻译了日本人青木正儿的文章,并以“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为题在1920年11月的《开辟》上发表。之后,在1927年8月,柳基石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以青园为笔名在《东光》上连载。1929年1月,梁白华在开辟社翻译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自此,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理论著作的翻译逐渐展开,特别是近年来,翻译出版活动表现得更为活跃。



形成了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读者层

在梁白华、丁来东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曾一度引起韩国社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开始受到重挫,特别是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项工作完全陷入崩溃状态。虽然在1945年光复后,曾出版了金光洲、李容圭译的《鲁迅小说选集》,但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0年韩国战争的爆发,两国的外交关系断绝,自此以后的数十年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被迫中断,留下了一段空白。

自1970年代起,这一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以1972年为起点,韩国中文系的数目迅速增加。虽然早在日本殖民地时代汉城大学就设立了中文系,但是直到光复前不过只有9名毕业生,光复后,每年也不过只有一到三名毕业生。到1972年,高丽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大学先后设立中文系,之后逐年都有增加。到目前为止,韩国共有11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中文课程。

随着中文系的增加,由此培养了大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及精通中韩文翻译的人才,而且,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读者层。与此相同的变化也体现在各种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学位产生趋势上。到1980年为止的数十年间里,在韩国发表的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硕士论文不足10篇,但进入1980年代以后,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至于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以来每年有数篇,尤其是1993年和1996年各有12篇。

[……查看更多内容请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

地址:北京市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总编室 Tel: (010)64076113 Fax: (010)64076113 E-mail: zbs_zzs@cass.org.cn

